

面对衰老 文学何为

——文学老年学与衰老创痛

邓 天 中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 随着全球化衰老的加剧,文学老年学应时而生,它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探讨文学作品中的衰老主题与作家生平,探讨应对衰老、批判文化中的衰老歧视、提升社会养老质量、提升晚年生命意义。文章在综述文学老年学的前期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其文化取向、理论建构、学科体系等方面所存在的不足;结合当代作品中关于老年书写以及死亡、便溺失禁、老年婴儿化、衰老成本等衰老创痛书写模式,指出了衰老书写中以老年人这意义客体为描写对象的缺陷,强调老年人必须走向意义主体的叙述自我救赎,追求低成本、高质量、充满创新意义的老年人生。

[关键词] 文学老年学; 衰老创痛; 年龄研究; 意义意志

[中图分类号] I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7)02-0029-012

“文学即人学”表示人们希望通过文学来定义人生。人这样一个千古“斯芬克斯”之谜充满了永远的变数。在西方,德尔菲(Delphi)阿波罗神庙入口处的上方用希腊文清晰地镌刻着“认识自己(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 know thyself)”。人生一世匆匆如白驹过隙,难得如愿真正找到自我,难以活出自己的生命意志。人要穷尽自己有限生命之一生一世,完成生命本来的可能使命,并且首先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自然寿命”。汉语文化讲“盖棺定论”,真正该盖的“棺”当然最好是指完成自然寿命的死亡,不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样一来,年龄研究(age study)进入文学批评^[1]⁵⁵就顺理成章,年龄已经成为探讨文学的一个重要选择,是文学批评中“最后的差异,是不曾明说却又无法回避的战场,不仅仅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差异,也是主体内部的,他们都是从各自年轻的自我中被放逐出来”^[2]。年龄与文学研究的结合,与全球人口老龄化同步,催生了全新的跨学科平台——文学老年学(literary gerontology)。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长足发展,文学老年学在文学性、老年社会性之间仍然摇摆不定,严重制约了其理论建构。基于此,本文拟梳理文学老年学的发展状况和存在问题,分析其学科的体系性、理论性中的不足,结合具体文学

中的描写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考,反思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健康衰老、合理养老与敬老这些当代文明进程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 文学与老年学的跨学科“联姻”

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出现了“生育高峰”(baby boom),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大量的“准老人”(即有了“年近半百”的衰老意识),并催生了西方文化中的“空巢”(Empty nest syndrome)现象,出现了“年轻老人”(the young old)与“老老人”(the old old)这些概念,呼应老年学意义上的“第三年龄”(the Third Age)与“第四年龄”(the Fourth Age),前者指年龄到了文化或公认标准认定的衰老年龄却生活能够完全自理的老人;后者指因衰老而卧病在床需要依赖他人照料、包括大脑失智的老人。二者并不存在“年龄”意义上的区别,只是衰老依赖程度上的区别。在这种人口结构的革命性变化背景之下,学术界开始做出相应的反应,出现了文学批评与老年学结合的强劲势头,文学老年学开始萌芽,安妮·M·怀亚特·布朗(Anne Marbury Wyatt-Brown)在1990年《衰老研究杂志》(Journal of Aging Studies)上“最早”^[3]宣布“文学老年学成年”^[4]，“文学老年学”的这一概念就正式进入学术视野,虽然在当时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算不上特别丰

[收稿日期] 2017-03-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英语小说中的衰老创痛主题研究”资助(编号:14BWW067);浙江省社科联基金重点项目“梅·萨藤日记与老年文存性研究”资助(编号:2013Z76)

[作者简介] 邓天中(1966-),男,安徽省宿松人,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

富,但数量却一直在增加^{[1]54}。怀亚特·布朗的这篇文章在 1992 年又被收录到托马斯·R.科尔(Thomas R.Cole)编著的《人文主义与衰老手册》一书^[5],2000 年该书再版时,怀亚特·布朗又重新撰文《文学老年学的未来》^[6],怀亚特·布朗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衰老问题,为文学老年学的发展作出了长足的贡献。

在文学老年学的影响下,跨学科结合迅速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响应。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又先后出现了“叙事老年学”(Narrative Gerontology)^[7-8]、“衰老诗学”(poetics of ageing)^[9],这些学科名称与主张虽然各有差异,但总体上都追求以文学的手段或视野来考察人类整体的衰老状况,来思考当代文明社会所无法回避的人口结构与人类文明的衰老进程。衰老主题也成为我们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1]53},在当前作家作品中变得尤为突出^[10]。

文学与老年学的这种结合针对的是生命科学与社会学这些传统领域里老年学研究在思考人类衰老现象时的不足,希望借助文学艺术的丰富想象力与虚构真实,特别是文学所独有的悠久人文关怀与呵护传统,来探讨在衰老边缘的生命质量。

作为一个对文学老年学贡献卓著的学者,怀亚特·布朗肯定了前期学者的研究努力,但也在努力克服其中的不足。例如她在讨论作品中的衰老时,就刻意加入了前期普遍忽视的作者创作年龄、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青年与中年的态度差异对比等因素。她在研究中坚持对文学性的关注,批评了部分学者在与人文主义老年学之间的结合时过于急迫地将历史、宗教、哲学和艺术联系起来分析衰老的做法,认为这容易将文学虚构看成社会数据。同时,前期文学老年学习惯于从文学文本中的创造性与超越的角度来探讨作家心理、衰老现象学,同样存在一定的将问题简单化的风险,比如将相应文学文本特征与心理学理论生硬地结合于文本分析。

怀亚特·布朗作为一个女性学者,对女性批评理论自然更为感兴趣,她因而特别强调,诸多的心理学理论基本上只顾及老年男性特征,而忽视了老年女性的存在。在她的影响下,后来的文学老年学批评就几乎成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天下,详情后面还将进一步论及。

怀亚特·布朗提出“整体人生”的概念(“entire life”)^[11],认为这是我们企图了解老年艺术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相应艺术特色的必由之路,不仅仅是为了讨论在文学作品中“老年”是如何被虚构、被表现的,也希望让人类从老年人物中学到有益的东

西,从而反思一个社会、一个具体的个人该如何理想地衰老、该如何在人生的每一阶段里既享受生活的福祉又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如何在老年却仍可以恬淡地接受死亡,真正实现诗人所设想的让“生如夏花般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让老年能以诗性的闲适来总结一生的得失,来思考以如何宁静的心情来迎接那无法回避的死亡。

另一位对文学老年学贡献较大的是美国华盛顿大学人文学科主任伍德沃德(Kathleen Woodward),她先后编辑出版了《记忆与欲望》(*Memory and desire:aging,literature,psychoanalysis*,1986),著作有《衰老与不满》(*Aging and its discontents:Freud and other fictions*,1991),并发表了大量与文学老年学相关的学术论文。伍德沃德将精神分析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来探讨衰老,她提出“老年镜像期”的概念,弥补了弗洛伊德与拉康婴儿镜像期对衰老的忽视,对镜像期在晚年生活中的特别表现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思考^[12]。再后来,伍德沃德提出,老年人通常会回避他们的镜像,借以回避岁月留下的残酷印记。他们经常会从别人的反应中了解到岁月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伍德沃德总结说,如果老人们能够暂时地忽视自己的衰老,可以起到“心理缓刑”(psychic reprieve)^{[12]69}的作用。从文学文本分析的角度提出这些关于衰老的心理概念,除了对心理学研究有特别突出的贡献外,也为老年人的成长,特别是精神与心理成长准备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在这些前期先驱学者的影响下,文学老年学的著述日渐丰富。其中古列特(Margaret Morganroth Gullette)算得上一位比较专注的文学老年学方面的学者,她的 4 部书均与文学、文化中的年龄或衰老直接相关,其《文化催人老》(*Aged by Culture* 2004)一书影响颇大,获同年普利策奖提名。古列特明确表达了对文学老年学理论建构的设想,尖锐地指出是当代的青春膜拜文化在催着人们迅速地老去:“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不管身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类首先是被文化催老的……年龄意识形态是我对整个规范系统的缩略表达”^{[13]3}。她希望找到一种理论可以“实用、明了、个性化,有诗学特征,有思考性,有激情”^{[13]11}。而且,作为一个女性学者,她难能可贵地一反该领域里其他女性批评工作者的常见批评姿态,指出“男性衰老是一个真正的禁忌主题”^{[13]106},她反对衰老研究中过分的性别区别。她曾用年龄自传(age autobiography)来探讨“退步—进步”的文化叙事以及她所定义的“年龄社会化”(age socialisation),试图替代老年思考中

被过分强调的性别偏差。在此基础上,古列特又进一步指出前面学者用到的“年龄身份”(age identity)与“衰老身份”(ageing identity)是一对相近概念,实际上是“年龄意识”(age consciousness),而且都带有明显的老年歧视色彩^{[14]124}。她认为老年人性别不分与生活的“无角色状态”(rolelessness),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老年危机感:“老年生活无角色状态对男人来说是一个严重问题,对女人来说是一个更大危机,而且开始得更早。容颜、生育能力、生产能力都已逝去,我们文化中步入中年的女性,虽然在大多数情形下离死亡还有非常漫长的距离,却在经历着过早的因忽视致死(death-by-invisibility)。”古列特指出老年文化中的“男女皆宜的性别模糊”(unisexual blur)现象,远不止是女性,“男性也在与更年轻的男性竞争,物化青春,购买再春”。古列特因而结论说“年龄凌驾于性别之上”^{[14]44}。

针对部分学者认为衰老主题文学较多呈现了“衰败的过程”,充满“阴暗的、令人不快的老年画面”^{[15]80},古列特认为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她讲衰老意识是生命历程中的下坡路,因此,我们要学会超越而不是简单地聚焦于“老年”^{[14]3-20}。在这一点上,她与伍德沃德的“心理缓刑”的衰老观形成了一定的呼应。

文学老年学的跨学科性除了像这几位学者把自己的大部分(如果不说毕生的话)精力放在研究文学如何面对老年学的各种复杂问题之外,还体现在有大量的文化学者或文学学者不时地将自己的研究焦点对准文学作品中的老年书写。霍普沃斯(Mike Hepworth 1957—2012)是英国的文化老年学学者。但他的许多研究材料都来自文学作品,他也曾致力于希望通过文学老年学来建立一个自己的空间,针对性地批判与老年相关的情感原型^{[16]183},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衰老过程的过分悲观主义^[17]与文化中的“仇老”现象^[18]。这些都明显区别于传统文学批评所希望关注的母题。更进一步地,霍普沃斯“要让作为读者的你来探索小说作为想象的资源来理解社会中衰老经历的含义”^{[7]1}。

概括来说,文学老年学从出现到兴盛,从研究人员到关注话题,都呈现出典型的跨学科甚至是跨多学科的特征,直接面向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是在全球老龄化背景下由“问题倒逼”催生出来的跨学科学术。文学老年学的这种对现实问题的浓厚兴趣和跨学科特色是其主要学科特征,但这也使得其学科建制、理论体系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总结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文学老年学的前期研究人员像怀亚特·布朗、古列特、伍德沃德等,都是女性学者身份,而且她们又都是从明显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背景中将自己的批评关注转向文学中的衰老的。这就使得即使在今天,整个文学老年学仍然呈现出以女性作家、作品中的老年女性或她们的衰老意识为研究内容的“一边倒”的性别倾向,似乎衰老的人群中只有女性。例如,布里南就在没有多少太让人信服的学术理由的前提下,声称选择要聚焦于英美小说中“当代女性作家笔下的老年女性形象”^[19]。

“女性主义理论”是文学老年学“最强劲发动机之一”^{[20]400},为文学老年学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华莱士认为这或许就是文学老年学走得如此深远的一个原因^{[20]391}。在“青春执着”的西方文化中,老年就是“他者”,是文学作品“让我们凭着想象把我们自己的衰老联系起来”,让我们了解那些比我们“更老”的世界,从而来理解我们文化中的年龄与衰老^{[20]389}。女性批评将老年文学作为自己的“最后阵地”,奇利·罗素(Cherry Russell)直接说“衰老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现象”^[21]。

我们承认女性批评为文学老年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也认同老年女性在人口比例上以绝对的优势压倒老年男性——但很难说这是女性的、或者文化的幸运还是不幸。我们甚至还可以承认,由于文化与历史的诸多原因,老年女性比他们的异性同伴在漫长的人生长河中遭受了更多的艰辛甚至是创痛经历;但是,不争的常识是:男性也会衰老,也会像女性一样遭遇各种衰老问题,女性主义批评实在没有必要将她们好战的姿态延伸到文学老年学中来。我们需要承认,虽然在老年性别差异还依然存在,例如卡罗琳·赫布拉恩指出女性生命轨迹迥异于男性,“或许仅仅是在老年,明显是五十之后,女人可以不再是女性扮演者,可以利用这一机会来颠倒她们最珍贵的‘女性’原则。”^[22]这无疑是在给衰老中的女性一次从传统性别歧视中解放自己的机会——文学老年学确实赋予了女性更多的成长机会,但这些机会都不是在研究中无视男性存在的理由。性别的战争硝烟弥漫了整个文学老年学研究的历史,使得以前的文学老年学几乎变成了“女性文学老年学”。在当代文学老年学研究中的老年男人的话语,或者建构一种无明显性别差异、歧视的话语也就提上了研究日程。何况在我们所读过的文学作品中有数量巨大的老年男性作家、老男人文学形象,还有许多从事老年研究工作的男性学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对男性的关注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探究的重要话题。

第二,文学老年学研究中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文学老年学的学科杂交特性使得其在研究过程中摇摆于文学与社会学的两个极端,因而未能充分突显其本身的专业特色。文学老年学的问题取向固然是直接面向各类社会问题,但毕竟在本质上区别于社会学科研究,其分析来源主要还是文学文本。文学老年学的出发点是考察文学对年龄的处理,包括批评工作者是如何讨论衰老与文学的关系^{[1]54},大量的文学文本虽然呈现了各种衰老景象,但真正的文学研究领域里对衰老的关注焦点还并不突出,文学素材的“文本特征”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应该说这种情况正在得到一定的改观,西方的一些英语主流文学批评杂志如《文学想象力研究》(*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s*)、《当代妇女写作》(*Contemporary Women's Writing*),与老年学领域里的权威杂志如《老年学家》(*Gerontologist*)都不断发表高质量的文学老年学方面的研究论文,表明文学老年学逐渐得到专业文学领域与权威老年学领域的各自认同与接纳;但从总体上讲,文学领域里对衰老的关注,还远远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也甚至远远落后于文学作家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另外,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目前尚无相应的学科建制,在读的文学博士也未见这方面的研究方向^{[1]58}。

第三,文学老年学存在如何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困惑。文学远不只是反映、反射社会、世界,而且是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参与社会的形构^{[1]54}。也就是说,文学即社会,文学本身就是老年学、也是人类文化、人类衰老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明在衰老,文学也有其诞生、成长与衰老的过程,文学与社会存在互动性的、交叉的衰老过程。教育体制内的学术建制与专业研究团队、项目的不足与文学老年学批评理论上的缺失有可能会形成一定的批评落差,即社会的强大需要与体系性理论建构的不足会导致某种意义上的恶性循环,会使得文学老年学研究在学术热闹的影响之下,过分受到文学文本或社会问题的掣肘,在一些常见研究问题上集中过多、过浅的重复讨论,不能够真正地把问题推向深入。

文学老年学界都抱怨“理论”的欠缺,怀亚特·布朗也指出了文学老年学依然在沿袭这种缺少理论建构的传统^[23]。尽管华莱士认为心理分析、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理论都可以在文学老年学中得到充分应用,但我们既不能停留在就事论事地孤立分析文学角色的衰老状况,也要防止将一切理论应用不加选择地应用于其中的倾向,而是需要采取全面、综合

的整体手段在一个全景语境中有针对性地看待人的衰老^{[20]406}。

文学老年学要借鉴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对老年病理研究的成果,包括老年失智现象、近死理论,甚至黑洞理论、事件视界概念等。文学老年学依托丰富的文学文本与文学批评理论,与老年学联姻,对外来批评有着较大包容性。例如马克思主义空间批评理论,将人的生命空间视为社会生产的历程,从空间角度来看,(人的)空间生产从身体与器官开始,将这种理论应用于文学老年学分析,“身体是空间生产的加工场所、空间行为的发生场所。从身体开始,个人空间通过向外部空间不断伸展其与外界的关系来建造自己的领域”^{[24]201}。这样一来,分析老年角色,就可以围绕老年人以身体为核心的空间生产来展开了。

因此,文学老年学的“理论缺失”不是一种真正意义的缺失,而是面对更加广泛的理论体系交叉时如何取舍,以期建构更适合于批评需要的问题。当然,文学老年学在批评视野与批评实践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在酷儿理论、外来移民的衰老等理应受到关注的话题尚未进入文学老年学的讨论中来^{[1]58},这些都需要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有针对性地解决。但更加急迫的问题是,如何更加深入地走向作家作品,寻找文学本身独特的机制是如何解释人类衰老状况、如何养老、敬老,特别是如何解决老年生命的意义与老年成长空间的问题。

二 问题导向的衰老与创痛

人文主义老年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阐释“老了的意义”(the meaning of old age),要“跨越衰老的躯体进入自己的思考”^[25]。之所以会在生命的这个时间段提出这个问题,一是由于生命的意义首先是要活下去,人死了生命就没有了“意义”;二是只有到了老年,“人一定会死”这样一个生命常识性话题才如此急切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人们对生的无限热爱,导致了对死的无限恐惧与好奇。几乎没有人(选择自杀或安乐死的除外)能够准确地知道自己会在哪一天死去,死亡又是如何真正地降临。文学作品中许多与老年或衰老相关的话题都在与死亡发生关联,像海明威等一大批作家那样直接将老年等同于死亡^[26],而在像奥斯特(Paul Auster, 1947-)那样一批后现代作家那里,老年形象甚至被用来“思考整个人类文明的衰老与死亡”^[27]。但诚如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唐·德里罗在小说《白噪音》中说的那样,“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来早

了。我们没有科学上的理由不可以活一百五十岁。按照我在超市里看到的报纸头条标题所说,有些人真活那么长。”^[28]人们一方面无法享受天然寿命,另一方面还以文化的方式让有限的寿命质量大打折扣——哪怕就是以我们今天见怪不怪的百岁高寿而论,大约在人们刚刚六十岁甚至更早的时候,我们就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把他们叫做“老人”。奥斯特在小说《密室中的旅行》中有过这样的观察:“‘老’这个词儿大有伸缩余地,你可以用它来形容任何一个六十岁至一百岁的人。”^[29]这就是说,文化凭着固有的歧视与残酷,将至少四十年的人生光阴,就这样简单地用一个“老”字轻松带过,将其等同于死亡。

也有作家比如菲力普·罗斯、多丽丝·莱辛等,会用老年便溺失禁来隐喻死亡^[30],突显了衰老与死亡的关联深深地扎根于人类文化传统之中,看到了衰老对生命质量的威胁,也看到了灵魂无所归处的苦闷。

在文化学与社会学的学术中,与老年男性公民相关联的一个词是“脏老头”(dirty old man),光是字面就给人以道德与伦理指责的联想。但是,在作家笔下,这种现象却恰恰表达了老年人对文化老年歧视的愤怒。面对死亡的恐惧,老年人(当然不止于老年人)会有许多奇怪的行为举止。坊间有戏称不知是如今的“老人变坏”了,还是曾经的“坏人变老”了。老人群体中出现了不少的老年失德、为老不尊的现象,集中表现在对待“性”,尤其是代际之间的性关系上,所谓“怀里搂着下一代”的“脏老头”现象。这种文化现象背后体现的恰恰是西方语境下的原型隐喻,即把生命理解为爱神艾洛斯(Eros)与死神桑那托斯(Thanatos)之间的角逐。当爱神处于上风时,生命就呈现出勃勃生机;当死神临近时,生命就垂垂老矣。老年人为了摆脱死亡与衰老相关的阴影,有时就会主动去拥抱爱神。

库切在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耻》(Disgrace)中就生动地刻画了一位刚刚年届五十的“老人”主人公卢里教授,面对自己衰老(严格意义上说,那不过是较早的“衰老意识”而非真正的衰老)中的性需要,他用一条公狗来比喻自己的天性本能:

附近只要来了条母狗,它就会激动起来,管也管不住,狗的主人就按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原理,每次给它一顿打。就这么一直打下去,最后那可怜的狗都糊涂了。后来它一闻到母狗的气味就牵拉着耳朵,夹着尾巴,绕着院子猛跑,哼呀哼的就想找地方躲起来^{[31]101}。

结果,天性受到抑制的“那可怜的狗后来竟然

讨厌起自己的本性来。再也不用人去揍它了。它随时会惩罚自己”。卢里因此结论说,“我看它可能还是宁愿吃枪子。它也许宁肯选择死,也不接受其他选择:违背自己的天性”^{[31]101}。

卢里自诩为爱神“侍从”^{[31]100},选择与爱神为伍向死神挑起不老的战斗,先后与妓女、同事、自己授课班级里的大学生发生性关系,从而招致更大的文化上、伦理上的“耻辱”,小说即因此而得名。这里所谓的脏老头,就是借性来表达自己的不甘就此衰老下去、不甘死亡的命运而作出的无奈抗争。

菲力普·罗斯(也译罗思)的小说《人性的污秽》,由65岁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祖克曼以作家身份讲述一位71岁的老年文学教授科尔曼的爱情经历。叙述者自称因为衰老的原因:

我已经有意地改变了我与犹如猫叫春似的性欲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劝戒或我的勃起,由于年龄在效力上大大减弱,而是因为我已不能支付它嗷嗷待哺的要价,不能调度机智、力气、耐心、幻想、反讽、热情、自私、恢复力——或韧性,或精明,或虚假,伪善,双重人格,色情技艺——以应付它数之不尽的误导和背后的前后矛盾的含义^{[32]38}。

而比他更老的科尔曼教授却与34岁的学院勤杂工陷入情爱的游戏之中,功力不济的他靠伟哥来支撑自己的老年性欲:

我把所有一切的颠鸾倒凤和快乐都归功于伟哥。没有伟哥,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没有伟哥,我就会对世界有一个与我年龄相称的看法以及全然不同的生活目标。没有伟哥,我就不会受情欲干扰,而拥有举止规范的年长绅士的尊严。我就不会做没意思的事。我就不会做不体面的草率的、考虑不周的、而且对所有相关的人都有着潜在危害的事。没有伟哥,我就可以继续在我的晚年发展一个有经验的、受过教育的、荣誉退休的,并早已放弃声色犬马享乐的老年人的那种客观、包容的视角。我就可以继续做深刻的哲理性总结,并一如既往地青年人进行坚定不移的道德感化,而不至于将自己推回到不断出现的性冲动的紧急状态之中。感谢伟哥,我终于明白了宙斯缘何需要各种多情的化身。他们应当给伟哥起那个名字。他们应当叫伟哥宙斯^{[32]33}。

一边是技术文明在助长身体的放纵并营造出一个快乐的世界,一边是社会文明在剥夺老年人最后的身体需要,把老人抛向无边的死亡沉寂。在文化的世界里,老年人是永远的他者、永远的客体。即使人们选择以尊敬、呵护的态度去善待老人,老人也不一定会因此而幸福。相反,有时还会产生逆反与厌

恶。人们或许会因为老年人的行动迟缓、耳朵背等原因,把老年人比作“老小孩”,出现了老年期的“(被)婴儿化”(infantilization)现象。表面上可能是出于照顾之心,但在老人那里却并不一定被接受。莱辛在《简·索默斯日记》中刻画了一个老年女性莫蒂的形象,她固执地让护士称呼自己为“莫德韦女士”,“不要宝贝长宝贝短地叫我。我的年龄足够做你的太奶奶”^{[33]246}。

老人因为年老而很容易像小孩一样大小便失禁,在社会学家那里是很“棘手”的问题,而文学家处理起来,就充分表现了人性与文明的各种多样性。能在这种场合下仍然走近老人并照料他们,足可以彰显人性的伟大。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老人也会有自己独立的自尊,更不消说被别人当作儿童来对待。叙述者简娜帮莫蒂换衣时闻到了异味,“我脱下她的衣服,看到她的内衣全脏了,尽管我知道她今天来的时候换上了干净衣服。她在发抖”^{[33]184}。如果在家里,或者在不需要单独面对公众的时候,老人纵然便溺失禁,她不至于“发抖”,而在公共场所,在陌生人面前,文化让老人无法容忍自己生理上的失控,任自己的自尊受到创痛性损伤。

洛奇在《聋刑》中描述叙述者的父亲在医院里,每天都在因为护士替他换衣服而进行最后的顽强抗争,戴斯蒙德在护士德芬的鼓励下最后帮父亲做了一次更衣护理,见识了自己父亲无味的大便,就有一种“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的感触,洛奇选择以极大的文学细腻从视觉与味觉上给读者制造一种当代阅读震撼:

这是非常奇特的经历,通过穿越禁忌的篱障,将婴儿—父亲的关系进行逆转。本质上说,我是在帮一个89岁的老人换尿布,但他正好是我父亲。首先我们得脱下他的睡裤与马夹,让他可以坐起来,我们好给他翻身。他的身体极瘦极弱,看着让人揪心,只是他块头大,所以扶他时依然死沉死沉的。他穿着塑料的短裤,里面是尿布。德芬用一块毛巾盖着他的下身,给他擦洗上半身,我替他拭干水。他拉了一小泡大便,倒不是太难闻,或许是因为他吃的非常少。她替他清洗他的私处,敷上粉,以崇敬与平淡的方式,然后将一根管子插到他的阴茎上,把一个容器绑到他腿上供导尿用。然后我们重新给他穿上睡袍、马夹与睡衣。把这样一个赤裸的Y字动物穿上衣服让我松了一口大气。扶着他,我手臂都扶酸了^{[34]282}。

戴斯蒙德选择的是“否定叙述”来表述自己对父亲大便的味觉反应,但这种否定表述中体现的是

一种直觉肯定,即大便不在乎它闻起来是什么味道,而在于这是大便。他的父亲在失智无语的状态下仍然会反抗护士的换洗,这是一种维护自己人性尊严的最后抗争。而当戴斯蒙德为他换洗时,他意外地表现得异常温顺。这让我们明显地看到,无论是清醒中死去的老人,还是在昏迷中走向终结的老人,假如有机会由他们自由选择的话,他们一定会选择由他们生命中的亲人来陪伴他们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罗斯的纪实作品《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中的老年父亲,出于自尊不让儿子扶,独自去“解决生理问题”^{[35]113}。接着就发生了一种令老人感到“他可能也希望自己还不如死了”的事情——他把大便弄得满卫生间都是^{[35]113}。罗斯看到卫生间里“到处是屎,防滑垫上粘着屎,抽水马桶边上有屎,马桶前的地上一坨屎,冲淋房的玻璃壁上溅着屎,他扔在过道的衣服上凝着屎。他正拿着擦身子的浴巾角上也粘着屎”^{[35]113},甚至“连水槽托架上我的牙刷毛也有”^{[35]114}。罗斯在清洗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与心理障碍可以想象。但他没有回避,甚至对于“那些嵌在不平整的地板细缝里和老式宽栗木板间的屎”,他不得不用自己的牙刷、用热肥皂水,“跪着洗了十五分钟”^{[35]115},连头发上都沾了一点点屎,完事后,为了除去异味,他努力用古龙香水在房间里喷洒,“手指像对待圣水一样挥洒香水”^{[35]115}。可能只有文学作品才具有如此的勇气,将衰老的真实状况表达得如此细节,当然不是为了读者恶心,而是为了伦理的升华与理性的反思:此时的罗斯内心的真实世界是,“如果让我天天干这个,我最后就不会觉得这么激动了”^{[35]116}。激动的原因是在平庸的生活现实中我们可以通过孝道来提升自己的灵魂,但如果时间长了,日子恢复了平庸,我们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所谓的“提升”。生活的压力,更重要的任务等着打理,不再激动的主体也只能是“久病床前无孝子”了。这种心理学概念上的“同情心疲劳”(compassion fatigue)比任何心理学研究成果都更富人性的震撼力。罗斯说:“我得到的遗产:不是金钱,不是经文护符匣,不是剃须杯,而是屎。”^{[35]116}

被现代文明敬而远之的便溺,在文学家的笔下,成了老人尊严、理解现代护理、当作代际遗产的母题。同样地,老人婴儿化也得到充分体现:在莫蒂那里是耻辱与抗议;在戴斯蒙德那里是年老父亲临终生命与自己孩童时光的对接;在罗斯那里,他听到年迈的父亲在电话里主动跟别人说自己的儿子“菲力普像妈妈一样的对我”^{[35]119}。没有了这些作家以挑

战当代卫生文化的极大勇气与对生活独特的理解,老人就都成了便溺一般的死亡隐喻,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在死亡与便溺之外,当代文学作品还清晰地呈现“衰老成本”这些尴尬话题。在如今的消费时代,老年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伦理悖论,经济上与道德上的压力让人们有些无所适从。高昂的“衰老成本”相比于“成长成本”、“教育成本”这些人生早期阶段的支出消费来说,似乎就成了一种“无意义”的支出。

第4年龄的养老成本与死亡成本计算起来非常昂贵。玛格丽特·福斯特1989年发表的小说《男人们够了吗》,刻画了一个处在第4年龄阶段濒死的老年人麦凯太太的人生最后失智岁月。老人在家请人陪护一晚需要30英镑,早上来的护理2.5镑1小时,下午来的陪聊2镑1小时^{[36]19}。这样一天下来,老太太的基本日常花费就接近40镑,而且还不包括其他的日常生活消费成本开支,像“照明、供暖、房租”,难怪老太太的一个儿子查理会感叹说,要是把老人送到老年之家,每周300镑的收费也算太便宜了^{[36]118}。这表明,在消费文化下,家庭养老相比养老院养老的成本而言要高出许多^{[36]19},唯一的区别是在家庭养老时,亲人随时出现在老人的身边,对于老人而言没有了养老院“监狱”式的不自由。

老人的女儿布里吉有心行孝,可是她却无力分摊老人的养老支出,她的大哥在维持一切开支。晚期一周就要花掉500英镑来支付全陪护理,家人仍然需要承担该承担的责任^{[36]200}。小账不可细算。当账本放在布里吉面前时,她根本没想到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哥哥已经花了14万英镑的护理费,还不包括她的房租^{[36]211}。面对这种情况,布里吉打算辞职照顾母亲,甚至计划靠申请政府补贴度日^{[36]211}。这里等于是告诉人们,在消费文化背景之下,即使是在英国这类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比较健全的养老体系,光有一份“孝心”还远远不够,孝心也需要计划、努力与高昂开支来实现,而不能光靠冲动与热情。而且,并不是说人死了,衰老成本就没了。当老人离去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接下来就是现代文明制度下产生的一系列“繁忙”的“死亡手续”:要死亡登记,要联系殡葬人员,要商讨棺材价格、丧车价格、神职人员与法事内容的差异与价格^{[36]238}。

尊老敬老考验的是一个民族的良知与道德底线,文明社会也一直在希望表达对老年人的各种善意。但是,当这种善意遭遇社会本身发展的挑战,甚

至给年轻一代的生活质量带来明显影响时,文明也会选择犹豫或沉默。面对养老话题,离开了钱是肯定不行的;但是,即使是从社会学层面探讨用经济手段提高老年福利、老有所养问题,也不可能解决老年生活质量、特别是精神情感方面的衰老问题。《论语》讲“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所谓的“养老”思路已经远远解决不了日益严重的老年人口增加所带来的系列问题,人们只有跟随文学的笔触去勇敢地拥抱多样性衰老的真实,才有可能懂得什么叫衰老。在死亡之外,如何善待老人的养老问题也是诸多与老年书写相关小说的频繁主题之一。即使在西方,“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也总是成为考验后辈与社会的良知的选择。每一个文明社会都会竭尽所能地做出很大的努力,但每一种努力都不可能真正地让老人如愿。因此,把老年人作为衰老的客体,永远都无法真正理想地解决衰老问题。老年人,也包括尚不曾老去的人们,都应该从老年文学作品中学到衰老的真谛,接受健康的衰老模式,从衰老的客体变成衰老的主体,尽可能地设计、操控自己的衰老过程。

三 从衰老的客体到衰老的主体

生命的意义注定要被死亡颠覆。死亡这种瞬间概念竟然要颠覆长达几十年的衰老过程,明白了这个道理的人们自然不甘心接受这样的命运。他们因而开始从死亡与衰老的文化等式中挣脱出来,努力追求生命意义,以主体的身份在当代文学中生动地活了过来。罗斯讲“老年就是战斗”^{[37]116},这种战斗与其说是与死亡的搏斗,不如说是与生命意义的搏斗。人的生命需要意义来赋予人性的光辉,带动生命积极地向着未来的终极目标前行。

维克托·弗兰科(Viktor Frankl 1905—1997)针对人的存在性真空(existential vacuum)提出了“意义疗法”(logotherapy),他解释该词源自希腊词根Logos,表“意义”(meaning),强调人类生存的意义以及人对这种意义的探寻。“人对意义的追求是他生命的第一动机而不是在本能冲动之外的第二理性”^{[38]105}。人对意义的渴求出自意义意志(will to meaning)。在弗兰科看来,意义意志比弗洛伊德的唯乐意志(will to pleasure)和阿德勒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更重要^{[38]105},因为唯乐意志放大了身体感官的快乐。事实也终于证明,感官分散的、无统一主题的快乐,无论是性的放纵还饮食的沉迷,都不能最终导致主体的幸福感。弗兰科讲监牢与老年都很容易产生“存在性真空”,而“在存在性真空中性

欲也会变得旺盛”^{[38]112},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前面分析的“脏老头”现象,即意义意志得不到较好的体现时,人会追求其他低级的放纵。

权力意志建立在与他人的比较与残酷的竞争前提之下,没有顾及有差异的个体不可能都能顺利地通向权力巅峰。因此,权力意志的实现不易,要靠激烈的打拼竞争,更多的时候要靠牺牲自己体内美好人性来作为条件;即使是实现了的权力意志,在被扭曲与破碎的人性面前,也毫无幸福可言。

遗憾的是,弗兰科在自己意义疗法体系建构中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关于的“意义”这样一个表面上简单却又非常难以理解的概念的精确定义。他有时将意义描述为训练有素的心理分析师对患者的治疗辅导,甚至可能是让患者“听到很不开心的东西”^{[38]104}。但他同时又解释,意义是人的“追求”,可以“激起内在张力”,“由于生命的这种意义很特别(unique)很具体(specific),必须、而且能够,由主体独立完成;唯其如此生命意义才有价值,会满足他自己的意义意志”(原文着重)^{[38]105}。

弗兰科一直在意义主体与客体之间摇摆,而文学老年学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则给出了多样性的回应。文学老年学将研究焦点放在“老年人在自己的生命岁月里如何生成与再生成个人意义”,将衰老看作“进行叙事意义生成、维系与改变研究的异常紧迫场所”^[39]。该研究领域一个前提就是生命不但“充满”故事,而且生命就“是”故事^[40],“心历的生活与讲述的生活密不可分”^[41]。布里吉斯讲“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故事,在生活的过程中讲述自己”^[42]。更有学者认为,“人生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近似文学文本”^[43]。文学老年学就是希望将老年叙事建立在生活是有故事的人生(we live storied lives)^{[1]57}这一前提之上。

应该说,人从“意义的客体”转向“意义的主体”非常困难,许多人在有限的一生都无法完成这样的转换,把无价的生命白白葬送在感官快乐的轮回之中。罗斯的小说《凡人》(Everyman)描述了主人公“凡人”一生都在为生命的各种享受奔波劳累,退休之后到了晚年,他计划写一本《一个男性身体的生与死》的作品,后改为绘画,“把这个题目给了他的一组抽象画”^{[37]41}。这种转换表明了他在被自己的意义意志所驱动,但他对自己表达意义的媒质——写书或画画——不满意,他或许是自认为自己的绘画技术超出了文字的表述功能,或许是他不满意于整个西方以词语为中心的逻各斯话语体系在表达意义上的先天不足——太过逻辑与理性,缺乏对立体

生命的体现与呵护。他既而转向绘画,但展现意义意志的意图和功用却是一致的。他希望将自己的传记主题围绕“男性身体”来展开,波斯诺克认为主人公将哲学信仰“不是放在上帝或任何其他的抽象符号上,而是放在‘我们身体’与身体衰竭的基本事实上”,这一种仪式化的努力是要“消除最后的事实本身就具有物质性”^[44]。

无论是生命还是身体,或许都只有到了晚年,经历过一生的时光来尝试生命与身体的各种可能,才能反过来回顾身体或生命到底是什么。但很明显,回顾或内省都不是生命意义的生成形式。意义意志强调面向未来将要实现的意义^{[38]104}。这是老年人最大的障碍,因为老年人在记忆中都是过去,几乎没有未来。在《聋刑》中,哈里在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新年接受别人新年祝福时说,“现在对我来讲新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新周快乐是我期待的最大祝愿了。”^{[34]218}老年人的生命意志首先要培养一种永远的开放态度,永不言死,永远有无尽的未来,否则,生命就容易陷入无意义的深渊。

《凡人》里的主人公躺在手术台上,正在以对生的无限渴望走向自己的死亡:

他想,日光普照大地,一个又一个夏日的阳光照耀在充满生机的大海上,真是一个光的瑰宝,它如此巨大,如此珍贵,好像他能透过刻着他父亲姓名首字母的夹眼放大镜凝视这个完美、无价的星球,凝视他的家园,这个十亿、万亿、兆亿克拉重的行星地球!他想着自己离死还远、命不该绝,渴望自己心想事成^{[37]148}。

这样的内心文字展现了主体内心对生活的无限留恋。不是别无选择,有意识的人不会放弃对生的渴望与努力。主人公用一个珠宝商人后代所熟悉的“克拉”这类用来计量钻石的单位,来衡量自己生活的硕大星球,其生命意义也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放大。虽然“他再也没有醒来。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不在了,不再存在,进入了 he 根本不知道的乌有乡。正如他当初的恐惧”^{[37]148}。面对任何人都必须面对的死亡,用一份充满意义的期待,享受那毫无未来的此在生活,仿佛每一个现在都指向无尽的未来,老年生命的意义也就得到了完美的阐释。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罗斯为什么把自己描写老年与死亡的这部小说命名为《凡人》,而且很小心——当然也是很费力地——回避了自己作品中主人公的姓名指称。因为他想写的是“人”——所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必须面对死亡——衰老——意义的艰难选择的人。人生活在这个如钻石一般宝贵的星球,生命

是如此可爱,只要活着就有意义,对永生的执着追求到后来甚至悖论性超出了死生的界限对生命的束缚。

“凡人”也曾遭遇意义危机,他自称选择“做了‘一个不可恢复的审美绝育手术’”,因为在老年时期对意义的怀疑使得他“跟绘画发生了激烈冲突”^{[37]82}。马克·弗里曼将晚年放弃叙事的现象称为“叙事权没收”(narrative foreclosure)^[45],在老年人中普遍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老年人面对文化歧视时的主动放弃叙述的应激保护机制。《聋刑》里戴斯蒙德是大学里的语言学教授,请年老的父亲吃完饭后,发现父亲立刻陶醉在自己老旧重复的话题之中。而且他注意到,父亲的叙述随着重复的次数增多而经过了“打磨”。孝顺的儿子没有表现出厌烦,而是像一个尽职的喜剧捧哏演员那样,配合父亲的叙述^{[34]57},不去打击老年人说话的兴趣,即使他们似乎是在无谓的重复,因为比起叙事权没收来,这是对大脑衰老的有益之举。

对于没有经过叙述训练的老人,积极的、互动性的倾听、有意识地提出一些经过深思熟虑的、严谨论证的或是训练有素的问题来激发意义意识、来产生互动与选择的需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意义的生成。在《坠落的人》中,由临床心理医生发起的,后来让主人公丽昂独立组织的让五六个老年失智初期患者讲故事的活动,虽然故事的内容与质量很一般,但老人很享受这样的过程:

这种写作行为使见解和记忆有机会得以交汇,小组成员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他们常常开怀大笑。他们探索自己的内心,发现混乱的叙事;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这样做显得十分自然^{[46]30}。

小说告诉我们,故事的情节与结构本身可能不是很重要,讲述与倾听才是重要的,因为其中产生了互动的意义。讲与听的双方都感到了彼此的存在价值。组织者为了增加叙事互动,加大了叙述选题的灵活性^{[46]30-31}。老年人的话语喜欢重复,这是意义产生的大敌,因为意义渴望不断的创新。缺少创新的讲述是心智衰老的首要症候,把想讲的故事先经过一定的思考写下来,可以让讲述者有意识地斟酌自己的新意,哪怕是措辞上的简单打磨。当然,这样做也可能存在不足,即讲述人对自己的已经书写过的情节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再次叙述的热情。鼓励讲述人自己决定题目,让每个题目都与讲述人“我”十分接近,以方便他们从熟悉的情节中创新。

制造叙事“距离”也是叙述产生新意义的一条重要途径。叙述者通过各种修辞手段让自己与叙述

中的人物产生一定差异。《坠落的人》中,卡曼·G喜欢用西班牙语词语包装自己的叙述;本尼·T讨厌书写,宁愿讲述出来^{[46]32}。在《凡人》中,绘画成了各自的表现手法。由于学员拘泥于老师的要求,所画内容结果是一塌糊涂。

修辞之外,叙述人称的切换也是制造叙述距离的手段之一。洛奇的《聋刑》也在进行类似的尝试。老年的叙述者以日记随笔的方式,不断地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中定期切换,都赋予了叙事的巨大自由度。老年不可避免地生活在岁月的记忆里。如果能够积极地选择积极的记忆方式,那便是日记随笔式书写。在《聋刑》里,主人公戴斯蒙德作为一个学院出身的教授知识分子,深深懂得这种道理。所以,在他的日常习惯里,他会主动地以试验的方式来尝试记录自己的生活。他首先是以随笔式的日记体记录自己认为值得记述的当日生活经历,然后再以一般现在时的第三人称角度,重新记录这一经历。他特别强调这是他以前在文体训练课堂上给学生练习时的方式。从中我们读出的是一个学者教与学的统一过程,教给学生的内容也正是自己努力实践的内容。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过去时与现在时的切换^{[34]10-11}过程中,他训练的不仅仅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更多的是在暗示,生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经历。

自知离死期不远的老人,也都有着兑现自己意义意志的愿望,但往往由于实现意义的媒质都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限制,他们往往难以如愿。从“凡人”不断更换探索意义手段的做法,到《坠落的人》中笨拙地摸索意义的老人们身上,我们都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所谓的生命意义,远不是一个固定的物体被丢在我们生命的某个角落,只等着我们的热心探索就必定会幸运地被我们发现。生命的意义因人而异,表现形式更是千差万别,我们用什么样的工具去探索生命意义,就会得到完全不一样的表现形式。

逸肯说,“叙事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而且是现象经历与认知经历的一种模式”^[47]。《坠落的人》被公认为是对9·11的“定义小说”,作者德里罗选择在小说中加入与故事情节似乎并无必然关联的老人,旨在表明虽然老人生活在社会边际空间里,却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离的真空中,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关注社会。他们终于不顾组织者的安排与希望,而是“想写飞机”^{[46]32}。恐怖事件发生后,社会虽然不希望小孩与老人也介入其中,受到恐怖事件更多的困扰。但是,无论是小孩还是老人,却都不由自主地对事件本身给予了出人意料的关注。在老人

的叙述中,他们讲述了事件发生时他们正好在什么地方,他们的熟人如何受到事件的影响,但更多的是,他们提到了上帝,想到了他们的信仰、宗教。

老年的讲述有时很费劲,不易被人听懂,容易造成交流障碍。好在丽昂听懂了卡曼·G的讲述,她发现讲述中的卡曼·G“看来同时是两个女人:一个坐在这里,逐渐失去了好斗性格,逐渐失去了明显特征,说话逐渐显得拖拖拉拉;另一个年轻一些,身材苗条一些,举止非常迷人,正如丽昂所想象的,一个活泼的女人,精力充沛,诙谐率直,跳起舞来身姿曼妙”^{[46]135}。老年是一场为生命意义而发起的战斗,但由于日渐力不从心,他们的好斗性格也必将逐渐丧失,宣告生命的终结。叙述就是让生命尚未终结之时,仍然保持意义生成的积极特征。为了加强意义生成的张力,讲述人与角色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既为不可靠性叙述留下了空间,更为主体的自由发挥产生了可能性。丽昂要求“他们在便签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姓氏的首字母。这是丽昂的主意;她觉得,这也许有一点矫情,仿佛他们是欧洲小说中的人物。他们既是角色,又是作者,能够讲述他们的希望”^{[46]31}。作者与角色的一体化,是文学家通过自己作品努力想传导的意义客体与主体之间合一或切换的理念。

在这种叙述里,语言与形式已经不是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内容。很明显,丽昂听懂了这些故事的实质,才会有听懂之后的恐惧。丽昂的恐惧来自她通过老人看到的自己将来衰老后的惨景;在后来,当她观察老人们在认真准备各自故事的过程中,又一次突然感觉到“害怕听到他们读在画直线的本子上写下的文字,害怕听到他们的讲述”^{[46]154}。因为她已经知道这些老人将要讲述的故事的结果了,她看到的“画直线的本子”(ruled sheets)^[48],所谓画着的直线,即意味着一种被控制,不管主体讲什么故事,他必须做的,却不过是完成、填满那早已被决定过了的空间轨迹。《坠落的人》中丽昂代表了一种人文情怀,是美国这样的发达社会对老人这类边缘化存在群体的关爱。从操作的角度来说,活动安排得非常细致,非常具有专业水准,甚至为了照顾老人难于控制行为的身体特征,连使用的纸张都是经过刻意挑选。小说中的这些细节告诉我们,关爱老人,不能光凭热情、爱心,还需要合理的理论指导。

大部分文明都将老年人应该退出社会生产的年龄约定为60岁或65岁。但在作家身上我们看到,65岁恰恰正好是他们创作表现手法与想象力最丰富、最成熟的年龄阶段。从文学老年学的角度来,老

年人由于身体器官的自然衰减或事故损失,许多曾经熟悉的创造性活动已经不再胜任了。但是,与他们相伴一生的语言却并没有受到显著性的损失。虽然在很多时候,他们会有“提笔忘字”、“开口忘言”的老年语言现象发生,而且这些现象也确实典型的老年语言衰老现象,但是这些现象就更明显地表达了叙述的两重意义:第一,通过语言的讲述,可以最大限度地通过“用进废退”的语言机制来延缓语言的衰老,同时也就是减缓身心的衰老。老年生命固然有许多的创痛经历需要去面对,但最大的悲哀还是心中有话却无法与人,包括与自己最亲近的人进行交流;第二,叙述是老年人晚年能够胜任的创造性活动,除了防止语言机能的衰退,通过各种隐喻象征的创新故事,他们的生命可能充满真正的意义。这既是弗兰科讲的意义给生命带来的前进张力,也是对生命意义的最好定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要做到有效地预防语言衰退的“伪叙事行为”,晚年叙事最好能做到书面而非简单地停留在口头。与老年人交往有一定经历的人都会知道,老年人讲话好重复,“陈芝麻烂谷子”,既不生成新意义,也没有真正训练到大脑的语言机制。但写下来,以固定的形式让故事定格,叙述者可以自我欣赏、修改,既能有效地避免无谓的重复,也能精进自己的叙事方式,让意义以更加精致美好的形式表现出来。

四 结 语

面对人类共同的大范围衰老,文学家、文学批评家都在积极地寻找对策,希望找到一种健康的衰老模式,既能够不断地修正、克服文化中的衰老歧视,又能够让老年以最低成本地享受高质量的生活。文学作品也就逐渐地不再将老年简单地等同于死亡、病痛、失禁、失智这些负面主题,甚至也没有刻意追求浪漫的笔调将老年描写成老年英雄式角色,而是主张让老年人成为生活的主体,以求新的心态,追求将生命的意义定格,以叙述、描写的形式不断地生成生命意义。许多高龄的老年作家已经向人们展现了这种生活可能,他们也在用自己的作品告诉那些已经老去、正在老去和愿意关爱老人的人们爱心人士,这种可能性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讲出自己的生命故事这样一个简便可行的行为,让自己的生命每天都充满新的意义,也让自己日渐衰弱、失控的生命可以在语言的互动式呵护之下,最大限度地放慢误差的速率。

然而文学作品也在告诉人们,即使是简单的讲述,也有其本身的操作规范与理论,比如生命的意义

必须是面向未来而不仅仅是回忆或反省,要做到先精确书写后讲述,书写要用到有直线格子的笺纸以帮助老人控制文字,讲述要适当拉开讲述人与故事中人的距离——即使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当语言不那么有效时,还可以选择其他的符号体系,如绘画、音乐来更加间接而真实地表述出自己的故事。严格地说,这些理论目前都还停留在偏感性、零散的阶段,还需要大量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断地观察、总结,以期让文学老年学更好地服务于老年生活中意义的产生。

[参考文献]

- [1] Sarah Falcus. Literature and ageing [M]// Twigg Julia, Martin Wendy. Routledge handbook of cultural gerontology. NY: Routledge, 2015: 53-60.
- [2] Bazin V, White R. Generations: Women, Age and Difference [J]. 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2006, 39(2): i-x.
- [3] Achenbaum W Andrew, Daniel M. Albert. Profiles in Gerontology: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M].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5: 369.
- [4] Anne M Wyatt-Brown. The Coming of Age of Literary Gerontology [J]. Journal of Ageing Studies, 1990 (4): 299-315.
- [5] Anne M Wyatt-Brown. The Coming of Age of Literary Gerontology [M]// Thomas R. Cole, Robert Kastenbaum, Ruth E Ray. Handbook of the Humanities and Aging. 1992.
- [6] Anne M Wyatt-Brown. The Future of Literary Gerontology [M]// Thomas R. Cole, Robert Kastenbaum, Ruth E. Ray. Handbook of the Humanities and Aging. 2000.
- [7] Mike Hepworth. Stories of Ageing [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8] Gary Kenyon. Storying Later Life: Issues, Investigations, and Interventions in Narrative Gerontology [M].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9] William L Randall, McKim E. Toward a Poetics of Aging: the Link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Life [J]. Narrative Inquiry, 2004, 14(2): 235-260.
- [10] Oro-Piqueras M. Narrating Ageing: Exploring Older Women's Attitude to Aging through Response [J].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013(27): 47-51.
- [11] Anne M Wyatt-Brown. The Narrative Imperative: Fiction and the Ageing Writer [J]. Journal of Ageing Studies, 1989, 3(1): 55-65.
- [12] Woodward. Aging and its discontents: Freud and other fictions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68.
- [13] Margaret M Gullette. Declining to Decline: Cultural Combat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Midlife [M]. Charlottesville, VA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7.
- [14] Margaret M Gullette. Aged by Cultur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 [15] Loughman Celeste. Novels of Senescence: A New Naturalism [J]. The Gerontologist, 1977(17): 79-84.
- [16] Mike Hepworth. Aging and Emotions [M]// Bendelow G. and S J Williams. Emotions in Social Life: Critical Themes and Contemporary Issue. London: Routledge, 1998: 173-188.
- [17] Joe Bailey. Pessimism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 [18] Freedman Richard. Sufficiently Decayed: Gerontophobia in English Literature [M]// Stuart F Spicker, Kathleen M Woodward, David D. Van Tassel. Aging and the Elderly: Humanistic Perspectives in Gerontology.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78: 49-61.
- [19] Zoe Brennan. The Older Woman in Recent Fiction [M]. McFarland & Co Inc Pub, 2005: 1.
- [20] Diana Wallace. Literary Portrayals of Ageing. In Ian Stuart-Hamilton. An Introduction to Gerontolog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389-415.
- [21] Russell Cherry. Ageing as a Feminist Issue [J].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987(10)2: 125-132.
- [22] Carolyn G Heilbrun. Writing a Woman's Life [M]. London: Women's Press, 1988: 126.
- [23] Anne M Wyatt-Brown. Introduction: Aging, Gender, Creativity. [M]// Wyatt-Brown and Rossen. Aging and Gender i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reativity. Charlottesville,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3: 1-15.
- [24] 邓天中. 亢龙有悔的老年: 利用空间理论对海明威笔下老年角色之分析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406.
- [25] Thomas R Cole, Ruth E Ray. Introduction [M]// Thomas R Cole, Robert Kastenbaum, Ruth E. Ray. Handbook of the Humanities and Aging. Springer Publishing Co, 1992: xi-xxii.
- [26] Tianzhong Deng. Hemingway's aged characters as the symbol of death [M]// O Hakola, S Kivistö. Death in Literature.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4: 103-119.
- [27] 邓天中. 当代英语小说中老年叙事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6.
- [28] [美] 唐·德里罗. 白噪音 [M]. 朱叶,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313.
- [29] [美] 保罗·奥斯特. 密室中的旅行 [M]. 文敏,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1.
- [30] Tianzhong Deng. Traumatic Incontinence of Old Age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M]// Karen O'Donnell. Ruptured Voices: Trauma and Recovery. Oxford: Inter-Disciplinary Press, 2016: 41-51.
- [31] [南非] J M 库切. 耻 [M]. 张冲, 郭整风, 译. 南京: 译

- 林出版社,2002.
- [32] [美] 菲利普·罗斯.人性的污秽[M].刘珠还,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 [33] Doris May Lessing.The Diaries of Jane Somers[M].London:Flamingo,2002.
- [34] David Lodge.Deaf Sentence[M].London:Penguin,2009.
- [35] [美] 菲利普·罗斯.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M].彭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36] Margaret Forster.Have the Men Had Enough[M].London:Vintage,2004.
- [37] [美] 菲利普·罗斯.凡人[M].彭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 [38] Viktor E Frankl.Man's search for meaning:An introduction to logotherapy[M].4th ed.Boston,Mass.:Beacon Press,2000.
- [39] Weiland S.Criticism between Literature and Gerontology.[M]//T Cole, W Achenbaum, P Jakobi, R Kastenbaum.Voices and Visions of Aging:Toward a Critical Gerontology.New York:Springer.1993:76-104.
- [40] William Randall.The Stories We are:An Essay on Self-creation [M].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5.
- [41] Bruner Jerome.Life as Narrative[J].Social Research,1987,54(1):11-32.
- [42] Bridges William.Transitions:Making Sense of Life's Changes[M].Toronto,Canada:Addison-Wesley,1980:71.
- [43] Stuart L Charmé.Meaning and Myth in the Study of Lives:A Sartrean perspective[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4:51.
- [44] Ross Posnock.Philip Roth's Rude Truth:The Art of Immaturity[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44.
- [45] Mark Freeman.When the Story's Over:Narrative Foreclosur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elf-renewal[M]//Molly Andrews.The Uses of Narrative:Explorations in Sociology,Psychology,and Cultural Studies.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9:81-91.
- [46] [美] 唐·德里罗.坠落的人[M].严忠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 [47] Paul John Eakin.Breaking Rules:The Consequences of Self-narration[J].Biography,2001,24(1):113-127.
- [48] Don DeLillo.Falling Man[M].London:Picador,2011:142.

Literary Approaches to Old Age and Aging

——Literary gerontology and aging trauma

DENG Tian-zhong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ed pace of global aging, literary gerontology has come to the fore to address the subject of aging in a systematic way, coping with aging mechanism, criticism, trying to come up with measures to enhance care for the elders, especially the meaning of life in old age. This study starts with a brief review of what literary gerontology has achieved so far, with a discussion on its biased feminist orientations, lack of theoretical and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fter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descrip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ing and death, incontinence, infantilization, and the costs of old age, it argues that the elderly have been largely treated as passive objects, and that aging salvation lies in the active quest for the meaning of quality life at a lower cost.

Key words: literary gerontology; aging trauma; age study; will to meaning